

掠夺性出版：动因、后果和道德困境

约翰·穆顿、玛西·范·尼克尔克

约翰·穆顿（Johann Mouton）：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评估、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教授

电子邮箱：jm6@sun.ac.za

玛西·范·尼克尔克（Marthie van Niekerk）：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评估、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主管

电子邮箱：mvn3@sun.ac.za

尽管人们普遍相信（或许也寄予希望）学者在向更广泛的受众发表研究成果时会遵循伦理规范，但多种不道德或欺诈性的出版行为多年来仍不断显现。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在 1942 年提出的“无私性（disinterestedness）”规范，强调科学家应仅以推动科学发展为目的从事研究。这一理想若能得到遵守，便意味着研究活动不应被用于个人获利、自我宣传或谋取个人影响力等目的。

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并非所有科学家和学者都能严格遵循这些规范。学术出版中出现了大量背离这些理想的行为，包括抄袭与自我抄袭、对女性作者的制度性偏见、利用虚假审稿人和虚假评审操纵同行评议程序、使用代笔作者等现象——而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学术界中掠夺性出版的兴起。

本文将回溯掠夺性出版的起源与发展，分析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在结尾部分讨论其对高等教育的更广泛影响。

起源与后续发展

“掠夺性出版”（predatory publishing）这一术语通常被认为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图书馆员杰弗里·比尔（Jeffrey Beall）。他在 2010 年首次提出“掠夺性”这

一说法，并于同年建立了相关网站和博客，由此被视为掠夺性出版的非官方“监督者”。由于长期收到人身威胁，他于 2017 年关闭了网站。比尔的名单现由一位匿名人士保存，而 Cabells 等商业机构也持续整理他们认为属于掠夺性出版商和期刊的名录。

在 2012 年发表于《自然》（*Nature*）的一篇更具系统性的文章中，比尔对“掠夺性出版”的含义作出了正式描述：“随后出现了掠夺性出版商，他们利用作者付费的开放获取模式，出版伪造的期刊，从中牟利。这些掠夺性出版商不诚实、缺乏透明度，目标是欺骗研究人员，尤其是缺乏学术交流经验的研究者。他们建立的网站与合法出版商极为相似，却出版质量可疑甚至极差的期刊。许多声称总部设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但实际上来自印度、尼日利亚或巴基斯坦。一些掠夺性出版商通过垃圾邮件向研究者索稿，却不提前说明需要支付的作者费用。”

比尔的开创性工作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关于掠夺性出版的定义及其普遍性的研究热潮。许多研究可视为比尔工作在科学领域与地域范围上的延伸。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掠夺性期刊的关键特征并未形成共识性的定义。

2019 年 4 月，加拿大期刊学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Journalology）召开了全

球掠夺性期刊峰会。来自学界与行业的参会者草拟了一个共识性定义,并随后发表于《自然》杂志:

“掠夺性期刊与出版商是以牺牲学术研究为代价、优先追求自身利益的实体,其特征包括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偏离最佳编辑或出版规范、缺乏透明度,以及采用激进或不加区分的投稿招揽方式。”

这一定义涵盖了此前文献强调的掠夺性出版的主要特征:将财务利益置于学术之上;伪造或歪曲期刊信息与关键指标;不遵循良好编辑与出版规范;商业运作不透明等。该定义为当前与未来关于“掠夺性”出版的讨论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主要成因与驱动因素

掠夺性出版以及其他可疑出版行为之所以在当代学术界广泛蔓延,主要可归因于两个关键驱动因素。

第一个驱动因素源自 20 世纪 90 年代数字出版的兴起,以及随后出现的开放获取(Open Access)运动所带来的机会。数字化使学术出版系统更容易被利用来谋取个人利益和经济收益。虽然开放获取的出现并非直接导致掠夺性出版商和期刊的产生,但它确实提供了使这类现象得以发生的条件。本文所讨论的几乎所有“掠夺性”特征,如伪造期刊、伪造指标、建立假网站与虚假编辑委员会等,都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和出版从印刷向电子形式转移而成为可能。

然而,开放获取运动与掠夺性出版的并存并不足以解释此类可疑出版行为在全球迅速扩散的现象。第二个驱动因素则与一种深植于整个学术文化中的绩效管理体系密切相关。这不仅仅是过去几十年“发表或淘汰”(publish or perish)文化的延续,而是一种以

新公共管理理念为基础、并通过新的学术绩效评估指标大幅扩张的体系。詹姆斯·威尔森登(James Wilsdon)在 2015 年将其称为大学里的“指标潮流”(the metric tide)。

其核心问题在于:高校中早期的管理主义,与近年来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和替代计量学(altmetrics)的发展相结合,再加上期刊影响因子和 h 指数等指标在教职招聘与晋升中的不当运用,导致学术评价体系日益量化、单一化。学术表现或成功往往被等同于某种分数或指标——更具体地说,是以数量、产出和计数为优先的指标。那些无法简化为数字的学术工作质性价值,例如研究深度、社会贡献、教学质量等,则常被忽略。

南非评估、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CREST)在 2018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让南非学者列出他们认为在获得终身教职或晋升时最重要的因素。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三项因素依次是:在 Web of Science 或 Scopus 收录的期刊上发表;指导并“产出”研究生;以及在高影响力期刊发表论文。同样引人深思的是:参与社区服务和为大学提供服务竟然被评为最不重要的因素。

掠夺性出版的影响

当开放获取(OA)运动的影响与一种高度依赖量化指标的学术文化叠加,再加上鼓励学者尽可能多发表文章、却不考虑质量或诚信的激励机制时,原本出于良好意图的政策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因此,掠夺性出版现象的蔓延并不令人意外。

当某些大学的学者长期持续地从事不道德的研究与出版行为——无论是掠夺性出版、故意参与发表与引用联盟(publication/citation cartels)、虚假署名,或其他形式的不端行为——这些机构的学术声

誉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玷污。此外,如果大学管理层对此类行为表现出容忍或放任态度,不仅会削弱整个学术界对该大学的信任,也会影响校友、资助者等利益相关者,最终损害公众对该机构乃至整个学术系统的信心。除非

学者对这些行为保持警觉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根除,否则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将逐渐削弱,而这将对科学事业的长期发展造成深远的损害。